

走进 契丹与女真王朝 的文学

第三届中国辽金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赵维江◎主编

显学总是能够吸引人，它的影响与弱势学科
总是不同。但弱势学科也自有它的吸引人处，
这里的开拓与原创机会或许更多。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走进 契丹与女真王朝 的文学

第三届中国辽金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赵维江◎主编

藏书章

显学总是能够吸引人，它的影响与弱势学科总是不同。但弱势学科也自有它的吸引人处，

这里的开拓与原创机会或许更多。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契丹与女真王朝的文学/赵维江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2

ISBN 7-5039-2935-9

I. 走… II. 赵…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辽金时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2790 号

走进契丹与女真王朝的文学

主 编 赵维江

责任编辑 陶 玮 文丽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邮 编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8.625

字 数 51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935-9/I·1345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本论文集由暨南大学“211”
工程“中国语言文学与海外华文
文学研究”项目资助

《走进契丹与女真王朝的文学》

编委名单

- | | |
|------|-------------------|
| 邓绍基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周惠泉 |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邓乔彬 |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
| 降大任 |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李正民 |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
| 刘扬忠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薛瑞兆 | 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
| 张 晶 | 中国传媒大学中文系教授 |
| 诸葛忆兵 |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
| 胡传志 |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 黄震云 |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
| 龙建国 | 江西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
| 刘锋焘 |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 方满锦 | 香港能仁学院教授 |
| 范长华 | 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教授 |
| 查洪德 | 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
| 周建江 | 肇庆学院中文系教授 |
| 赵维江 |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



第三届中国辽金文学学术研讨会于 2004 年 11 月 17 日在广州珠江之畔开幕，图为暨南大学副校长贾益民教授致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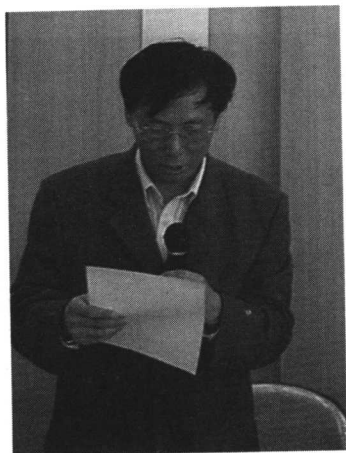
研讨会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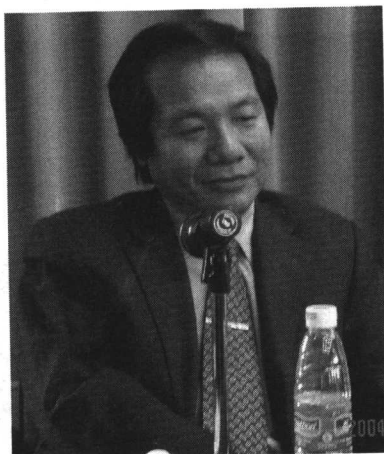
暨南大学文学学院院长陈伟明教授致辞



暨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邓乔彬教授致辞



肇庆学院中文系主任周建江教授致辞



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副会长、研讨会执行主席赵维江教授（暨南大学）主持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邓绍基
教授作主题报告



中国辽金文学学会会长张晶教
授(传媒大学)作学会工作报告



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正民教授(山西大学, 右)、胡传志教授
(安徽师范大学, 左)主持会议

对弱势学科与方法论的思考（代序一）

邓绍基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有一部分已经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最受关注，比如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中的“四大名著”，而辽金文学虽然也有元好问这样的大家，但总的来说是不大受重视的。维江先生曾跟我谈到“古典”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区别问题，如何突破“古典”的限制，打开“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确实值得我们认真考虑。我就从这个问题开始，从文学史研究的全局发展角度，来谈谈关于辽金文学研究的一些看法。

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学术研究百废待兴，古代文学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当我们回忆起80年代的时候，马上就会想到方法论的引进和丰富，即所谓“新方法的爆炸”。不过，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来看，当时值得注意的还不仅仅是方法论的问题。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一点学术组织工作，我记得无论《文学遗产》还是《文学评论》等召开的座谈会，所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求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薄弱环节甚至空白领域的研究。当时我们认识到，这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具有全局性意义，而非仅仅是一个局部性问题。比如元代文学史中的戏曲研究是显学，“五四”以来有不少名家，而元代诗文研究方面则非常薄弱。所以我们在编《元代文学史》的时候，多花力气于诗文方面。还有一些文化现象，这似乎是一些具体的局部的小问题，但是，累加起来却成了全局性的问题。我还参加过在甘肃武威举行的五凉文

学研讨会。西晋灭亡，东晋偏安江南，文化人主要聚集于建康，而另有一小部分文化人则向西行，聚集于张氏父子把持的凉州，类似于抗战时期文化人聚集的桂林。这样的史实，在文学史上是根本就不会提到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地域文化及文学研究是有意义的。这些若明若暗的现象弄清楚了，对了解南北朝文学乃至文学史整体都是有意义的。清诗应当是一个“大国”，但那时也成了研究上的薄弱环节，苏州大学成立明清诗文研究室，《文学遗产》与他们联合召开清诗讨论会，起过一定作用。当时近代文学研究也需加强，我们与各地研究者联合召开讨论会并坚持下去，也收到了好的效果。

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来看辽金文学研究。我一向认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成熟和兴旺发达，应当至少有如下三个标志：首先，此一领域内文献资料的积累和整理应当具有基本的规模；其次，学术论文及论著不断出现，而且出现被学界公认的优秀著作甚至权威性著作；再次，出现一批专攻或兼攻辽金文学的学者，其中还应出现一些被学界公认的优秀学者。我看辽金文学研究的奋斗目标也大致如此。辽金文学文献资料方面，像《全金诗》、《全辽金诗》、《全辽金文》等都出版了，尽管在这方面有前人的基础可以参考，但是辽金文学研究者的整理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其他论著也多有成绩与创获。从学术研究来看，过去对金代文学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金代文学就是赖元好问以传，没有元好问，就没有金代文学。我认为这样的看法不全面。我们当然承认元好问是大家，他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在金元之交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做了大量挽救和保存文化的工作。元人所谓“斯文命脉赖元、杜诸公为主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元好问请元世祖忽必烈接受“儒教大宗师”称号，其用意即在于保存文化传统与人才。元好问在金元之际所做的这些保存金代文学文献乃至文化的工作，其意义是极为重大的。所以，过去研究金代文学集中在元好问身上并不奇怪。但就金代文学史全面研究来说，视野必须要更广阔。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首先撰文推崇王若虚的是郑振铎先生，可称独具慧眼。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辽金元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上不断推进，不断深入，是在创造历史。把辽金元文学研究深入推进，这绝不是一个细小问题，而是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事关文学史研究的全局。

自然，辽金文学研究领域还有很多要做的工作。由于前人的积累较少，在辽金文学研究方面往往出现一些困难。文献资料方面仍然有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文献资料校正的问题。我们知道，清代人编辑的《全唐诗》，后人的补充、校正甚至批评意见都不少，因为其中出现了张冠李戴、同名重出等情况。可能这种情况在辽金元作家作品方面也不会少见，比如元代诗人萨都刺的《雁门集》中就有他人作品混入，卢琦的《圭峰集》中他人诗作更多，还有编集人故意作伪现象。我的同事杨镰先生正编纂《元诗全编》，他说此类问题不少。又比如针对王树林先生的《金末诗僧性英禅师考论》一文，有的先生提出注意不要与元代英上人相混；元代英禅师的作品很多见于张羽的集子。还有，在杨宏道的集子里，我偶然发现其中竟然有“元诗四大家”之一杨载的诗歌，还有送张雨的诗。杨宏道去世的时候张雨还在南方，未到大都，怎么会有杨宏道在大都送张雨回南方的诗呢？王树林先生告诉我，杨宏道集子里混入别人的诗作不止一两首，这提醒我们在整理辽金作家别集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在一代作家的作品全集、主要的别集以及历代汇评整理方面，还有不少辨析考订工作要做。元代杂剧的起源方面，至元年间元淮的诗里已经看到了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流行于世的消息。日本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最早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北曲杂剧到忽必烈至元年间才出现。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中提到，“其备则自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备”即完备，完备不等于开始。杨维桢《沈氏今乐府序》说“出于关（汉卿）、庾氏（天锡）传奇之变”，我们知道关汉卿在元杂剧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单指关汉卿创造杂剧，那是一种形而上的说法。如果我们注意到杨维桢《宫词》“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那么，是否在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的建



议改国号“大蒙古国”为“大元”的时候有人“进剧编”？有没有可能在金末或蒙古国时期，杂剧就已经出现了？这是很有可能的。加强金代文学的研究，有可能找到“备”之前的一些线索或材料，从而改变或补充文学史上对元杂剧起源等重大问题的传统看法。

在研究元诗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元代宗唐风气可以上溯到宋、金。明初瞿佑讲到元代诗坛“举世宗唐恐不公”，我发现，实际上元代“举世宗唐”的局面是由两股潮流合力形成的。金代后期诗人宗唐，南宋末年诗人也开始宗唐，但两者之间还有区别。宋末元初如戴表元、仇远、白朴等人的宗唐（仇远说“近体吾主唐，古体吾主《选》”），从其言论及创作来看，尚未有所谓初唐、盛唐、中唐之分，因此诗歌创作上也呈现各种风姿；而金代诗人如元好问等则主要推崇盛唐。关于金代宗唐的起源问题，我跟张晶先生的看法有点不同：他认为金代宗唐起源更早，我还是传统的看法，认为基本上是从赵秉文开始的。赵秉文的老师王庭筠推崇宋代苏轼、黄庭坚，而赵秉文后来改弦更张，主张学习唐诗。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师承家法，不能越雷池一步，赵秉文此举因此被人目为与师争名。赵秉文改变门庭，改崇宋为宗唐，这是传统师法上的一个叛逆，也是金代诗风的重大转变。举这个研究元诗的例子，目的在于说明，为了研究元代诗歌的发展，我们必须上溯到金代文学。

随着我们对辽金文学研究的深入，很可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成绩，至少有所补充，有所完满，甚至有所突破。这对研究者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文学史薄弱环节的重视，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对新方法的引进和借鉴。新方法的引进对开阔研究者的视野，特别是冲破教条主义的模式是很有作用的。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规律性现象，其间也就有吸收和借鉴新的研究方法的问题。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并不是学术研究的最终结果，最终衡量一门学科或一种学问兴盛繁荣的主要标志是质量的提高和学术的深度。因此，20世纪80年代新方法热中出现的强调方法更新就是一切的片面观点逐渐被扬弃了。从二十

多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实践来看，扶植弱势学科，加强对薄弱环节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建设性的。二十年来很有成绩，而且逐渐形成各个研究队伍，出版了不少开拓性的著作，虽然不像方法热那样有声势，但所取得的成就十分可观，所以我说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新方法的引进。之所以这么说，因为这两种现象在二十年前几乎同是学术界着力呼吁和提倡的，所不同的是，扶植弱势学科并没有出现“热”，更没有什么“爆炸”。从文学史的研究范围看，我们也决不能只局限于“古典”、“经典”，而应该像维江先生提到的那样，把眼光放到整个古代文学。

马克思曾经说过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话，如何看待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显学总是能吸引人，它的影响与弱势学科总是不同。但弱势学科也自有它的吸引人处，这里的开拓和原创机会或许更多。我在前面说的衡量一个学术领域兴旺发达的三个标志，其实也是由“弱”转“强”的重要标志。如果我们查一下1949年—1966年6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十七年间的金代诗文研究论文只有十篇（其中九篇论元好问，一篇论王若虚），诸宫调论文则有十一篇；对照一下1980年以来的辽金文学的研究状况，真可说是恍同隔世。二十年间来了一个“大跃进”，数量与质量上都在飞跃前进。使辽金文学研究由“弱”转“强”，用流行的话来说，做大做强，改变一门学科的面貌，不就是创造历史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言稿由暨南大学何志军博士整理）

辽金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代序二）

张 晶

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感受到了两种趋势：一是古代文学博士点的增加带来的研究队伍的扩大；二是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而引起的学术创新度的弱化。那么，古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初叶应当如何发展，就不能不成为我们追问的一个重要问题！辽金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部分，自然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对于近些年来辽金文学研究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向作一点思考，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辽金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各个断代中比较而言有点“弱势”，所以从国内 20 世纪这一百年的研究状况看，80 年代之前，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相关的成果还是很少的；但这种情形从新时期以来有了很大的转机。进入 90 年代之后，直至今日，辽金文学研究一直呈现着“走强”的势头。现在的辽金文学的专家学者，早已不是原来的几个人；现在的研究对象，也远非原来的一个作家（元好问）和一个作品（《董西厢》）；现在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只有原来的那几本书和十数篇论文。辽金文学的研究已经有了一支遍布国内和海外的大学 and 科研院所的成熟的学者群体；已经有了几十部学术专著和数百篇论文；已经有了更为深广的研究领域。也许，原来的辽金文学研究还只能是唐宋文学的“附属国”，而现在已经凸显出自己的独立地位和完整的学术构架。如果要对辽金文学研究略加回顾的话，我以为对于古代文学学科发展而言，辽金文学研究从自己的角度，贡献了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成就和有益的启示。

一是这些年来辽金文学研究，学者们以严谨求实的治学之风来探索，因而，所取得的成果是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含量的。新时期以来，文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方法论热”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方法。这使文学研究出现了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脱离研究对象客观情况、仅凭主观臆想的空谈之作。浮躁虚妄的风气，曾一度在学界大行其道。辽金文学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则是体现了严谨求实的学风。检视辽金文学的研究成果，总体上给人以颇为笃实的印象。无论是个案研究，抑或是史的建构，都是在大量的文献分析基础上进行的。辽金文学研究这些年来在文献整理方面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薛瑞兆、郭明志、狄宝心、阎凤梧、刘达科、康金声、王庆生等学者，都在辽金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薛瑞兆、郭明志两位教授整理校点的《全金诗》（四册，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所收金诗比起清代郭元釵的《全金诗》来增加了近一倍。阎凤梧、康金声编《全辽金诗》（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将辽金两代之诗合编为一帙，规模颇全。姚莫中主编的《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是目前元好问诗文集最为完备的版本。王庆生点校增补的《金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比起原来的《金诗纪事》，增补了240家。刘达科在金代文献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是值得重视的，他这两年先后发表了《辽金元史志书目通览》、《建国以来元曲选本书录》、《今编全集型辽金元总集叙录》、《辽金元书目剧目通览》、《辽代文学史料保存整理述论》等文献研究的论文，对于辽金文学文献的研究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文献整理和研究这种性质的工作，是辽金文学研究的基础工程，它是凭借着坚实、熟练的考辨工夫进行的，而近年来的辽金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辽金文学研究升上一个新的境界开拓了道路。

辽金文学研究原来缺少“史”的建构，而近年来在这个领域已有数位学者撰写并出版了专史，如张晶的《辽金诗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赵

维江的《金元词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陶然的《金元词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詹杭伦的《金代文学思想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专著都是专门的文学史著作。这些辽金文学史著作，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建立在扎实的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而又对辽金文学的发展作了客观的描述。因此均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获得了较高程度的认可。

辽金文学研究具有客观存在的文化史价值。辽金两代均为中国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与中原王朝有着文化上的差异性和互融性。中原文化是以源远流长的汉文化为其传统和核心的，而北方的游牧文化在与中原文化的互相冲击与互相交融中得以成熟和提高；中原文化也因得到北方游牧文化的刺激而生发出新的活力。这种文化的互动在辽代和金代都是非常典型的，而对于辽金文学独特风貌的形成，是其至为关键的因素所在。在新时期以后的辽金文学研究中，文化学、民族学的视角就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切入点，由此也带来了文学史研究的新的样态。张晶较早出版的《辽金诗史》，即是以文化社会学的方法而建构的一部文学史著作，在这方面，作者是有着理性的自觉的。黄震云的辽代文学研究，也是以文化背景的描述作为其支点的。对元好问的文学思想、创作风貌的考察，也多有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切入的，从而使元好问研究呈现出更具理论层次的延伸。如狄宝心从文化角度对元好问所作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情形。胡传志在他的专著《金代文学研究》中对于《中州集》进行了文化意义的阐释。日前召开的“第三届中国辽金文学学术研讨会”和“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有若干篇从文化的内在联系揭示辽金文学特质的论文，赵维江的《北方地域文化与辽金元文学》就是一篇很有学理高度而又密切结合辽金文学实际状况的力作。

与此相关的是对于辽金时期少数民族作家的研究。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在这两个时代都有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留下了他们的作品，而且是有突出的特色的。他们的创作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族背景，而又因他们接受了汉文化和汉

文学的传统，使其创作有着不同一般的美学素质。近年来的辽金文学研究学者们多有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深度考察，如对辽代王室耶律倍的文学创作的探究，对契丹女诗人萧观音、萧瑟瑟的诗词成就及其成因的揭示，都体现了这种角度。在金代文学研究中，女真帝王完颜亮和金章宗的诗词都有不止一篇的专文研究。女真诗人完颜璹也有专文论及。周惠泉有《完颜璹研究》收入其《金代文学论》一书中。张晶有几篇文章都论述了辽代契丹诗人和金代女真作家的创作。此次第三届辽金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台湾学者郑靖时提交给大会的一篇论文《金源女真人诗作评析》，对于金代的女真作家的发展概况作了全面的梳理，并对完颜亮、金世宗、金章宗、完颜璹等作了个案分析，很有学术价值。

注重哲学和宗教思想与文学的关系，是近年来辽金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辽金文学有其独特的思想文化渊源，而在哲学、宗教的领域既有深受中原的哲学、宗教传统影响的方面，又有其特殊性存在，可以说，辽金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和宗教史的颇具特色的一页。譬如全真教作为金元时期的重要宗教流派，其社会影响及其对文学的浸染都是非常广泛的。近年来一些学者从哲学的、宗教的层面对辽金文学进行开掘，取得的成果是颇有厚度和深度的。降大任的《元遗山新论》，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意义的。降大任对中国哲学和历史非常熟悉，他在这部著作中，对元好问的哲学思想作了深入的阐释。在这次第三届中国辽金文学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中，从宗教的角度来看辽金文学的文章有十来篇，颇为集中地体现了这种趋势。如李正民的《试论佛教对元好问的影响》、张晶的《李纯甫的佛学观念与诗学倾向》、张兵的《从〈西游录〉看辽金元时代的一次佛、道斗争》等文章，都深入具体地分析了佛道思想对辽金文学家的重要影响，从而揭示了如元好问、李纯甫等作家的艺术风貌的一些深层原因。全真教是金代的特殊宗教，全真教中人却又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这次的论文有几篇是专论全真教道士诗词创作的，如许兴宝的《王重阳词简论》，全面地研究了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的词作。徐翠先的《谈丘处